

运用新媒体是党政干部的必修课

曹普华

新媒体正前所未有地改变着人们的交往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并日益渗透到文化、社会、政治、经济等各个领域，给我们党治国理政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和变革。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政治工作过不了网络关，就过不了时代关”，运用新媒体已经成为各级党政干部前所未有的必修课。

习近平总书记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古人说：‘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很多网民称自己为‘草根’，那网络就是现在的一个‘草野’。”根据《第4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20年6月份，我国网民规模达9.4亿，网民通过手机接入互联网的比例高达99.3%，可见新媒体已成为群众活动的一个重要阵地所在。我们必须与时俱进、与民俱进，重视好这个阵地。提升新媒体素养，已成为一些党政干部的当务之急。具体而言，还存在如下一些短板：一是对运用新媒体认识不够，二是运用新媒体的能力不够，三是对运用新媒体的要求不够。各级党政干部必须加强学习，补上运用互联网这门必修课，过好互联网关。

从某种意义上说，目前运用新媒体还只是属于党政干部的个人能力训练，还没有统一从组织层面列为党政干部的一项基本要求。在党政干部绩效考核评价和人才培养机制中，都没有对运用新媒体的能力设置相关的指标体系和激励制度；没有从学习上对党政干部运用新媒体的技能进行相关要求，以敦促党政干部提升运用和管理新媒体的能力。缺乏对党政干部运用新媒体的刚性要求，增强新媒体素养，运用新媒体提升行政能力就难免成为空谈。

学会运用新媒体，是时代对党政干部的必然要求。民意上了网，各级领导干部就必须“经常上网看看，潜潜水、聊聊天、发发声，了解群众所思所愿，收集好想法好建议，积极回应网民关切、解疑释惑”。党政干部应当清醒认识到执政环境的巨大变化，以高度的自觉和积极的心态建设、使用和引领新媒体，不断提高对新媒体的认知能力、应对能力和利用能力。

1. 打好“懂”的基础，把握新媒体自身运作规律。各级党政干部要从“懂”新媒体是什么入手，学会使用网络论坛、贴吧、微博、微信等新媒体工具，参与新媒体活动，使用新媒体语言，把握新媒体传播规律，了解应对新媒体的各种样式。要从“懂”新媒体怎么用着眼，运用新媒体拓展互动交流平台和建言献策渠道，引导社会热点，吸收群众意见、接受群众监督。要从“懂”怎么用好新媒体发力，在新媒体活动中及时发现和洞察各种社会矛盾，掌握舆论动态，主动利用新媒体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为生态文明建设新作为筑牢制度保障

张四梅

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考察时强调要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落实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制，坚决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省委十一届十二次全会提出了“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远景目标和“能源资源利用效率大幅提高，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持续减少，重点环境问题得到有效整治，生态环境持续改善”等“十四五”时期主要目标。落实这些目标，湖南要制订和落实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制度，为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展现新作为提供制度保障。

明确知责强责意识。一是强化领导干部生态环境保护的政治责任。领导干部作为一个地方重大事项的决策者，对生态环境负有重大责任，必须坚决扛起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的政治责任，严格实行党政同责、一岗双责。二是明确政府部门生态环境保护的监管责任。生态环境保护是个系统工程，涉及部门和领域众多。一方面，尽快出台边界清晰、分工合理的政府职能部门生态环境保护责任清单，明确责任部门、监管职责、监管依据、监管事项以及不履行监管职责的情形等，划清担负环保责任各部门的权力和责任，明确其边界职责。另一方面，要建立常态化的跨部门协调机制，协调各方力量合力攻坚。三是落实企业生态环境保护的主体责任。《环境保护法》等法律法规明确规定了企业环境保护的责任。一方面，通过各种宣传宣教活动提高企业认识，主动依法担起环境保护和治理责任。另一方面，加强企业

环境治理责任制度建设，督促企业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对重点排污企业进行重点监测与督查，坚决杜绝治理效果和监测数据造假。四是激发社会组织和公众监督责任。不断健全社会组织和公众参与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的相关制度，利用各种媒介，尤其是自媒体，通过宣传教育、信息公开、多方沟通、公众评议等手段，积极引导社会力量参与环境保护执法，强化对生态文明建设的监督作用。

考责审责明方向。考核评价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指挥棒”，只有不断优化生态文明建设考核评价体系，才能真正落实责任，从行动上重视生态文明建设。一是完善任务导向的目标考核体系，根据各地实际情况制定更加细化的具体减排指标、环境质量改善等具体任务指标、五年规划中的约束性指标以及其他专项考核。二是优化领导干部生态考核评价体系，将生态文明指标纳入领导干部考核评价体系，并逐步提高综合考核中的生态比重。将各级党委、政府及其有关部门落实环境保护管理职责的情况，作为领导干部考核的重要内容。对于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做得好的干部予以重用或提拔。三是实行差别化政绩考核制度。逐步改变自上而下的统一考核制度，不同主体功能区设置不同的考核指标，如一些重点生态功能区着重于生态保护优先的绩效评价。四是对各级党政领导干部任期内所辖区域内的自然资源资产变化情况进行审计，综合评价干部任期内的自然资源保护情况。

2. 做好“用”的文章，强化对运用新媒体的标配。“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善于利用新媒体，对党政干部来讲已经不是什么个人爱好和兴趣，也已经不是什么个人能力和素质，而应该成为一种从上到下的制度化标配。强化能力标配，培养一批有影响力的党政干部成为新媒体大咖，将提升各级党政干部应对新媒体的敏锐力、表达力、行动力和驾驭力，纳入干部日常学习计划中去。强化机制标配，将党政干部的媒体素养纳入干部的考评、考核、考察体系，敦促他们正确对待新媒体，主动提升自身的新媒体素养。强化平台标配，“意莫高于爱民，行莫厚于乐民。”积极搭建好与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和行政理事相适应的新媒体平台，大力做好新媒体平台赋能工作，打造一批喜闻乐见、风清气正的新媒体。

3. 练好“引”的功夫，提高对新媒体舆情的引导能力。新媒体反映民生又凸显民怨，它传递民情又集聚民惑，它彰显正义也加剧矛盾，它寄托公信也生产偏见，是一把双刃剑，必须练好“引”的功夫。要坚持公众导向“引”。积极主动与公众沟通，最大程度地倾听和吸纳公众诉求，及时掌握舆论导向。要保持开放互动“引”。党政干部要能熟练地使用新媒体，从论坛、博客、微信朋友圈等多渠道及时获取反馈信息、及时作出回应、及时与网民形成良好互动。要主动设置议程“引”。针对有可能出现的社会热点问题和大众关切，主动提前设置议程，及时掌握舆论引导权，阻断有害信息和杂音噪声的蔓延，让新媒体变成喷发正能量的阵地，共同营造健康向上的舆论氛围。

（作者系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党组书记、院长）

谭建上

沿着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发展作出的科学指引，湖南省委十一届十二次全会旗帜鲜明提出大力实施“三高四新”战略，清晰指明了建设现代化新湖南的根本方向，为我们做好“十四五”乃至更长时期的各项工作提供了路径遵循。桂东将坚决以“三高四新”为发展总战略、总牵引，加快建设“红色桂东、美丽桂东、开放桂东、幸福桂东”，奋力谱写好建设现代化新湖南的桂东篇章。

激活红色引擎，把基因内力转化为发展动力。致力从红色文化中汲取砥砺奋进的精神力量，发挥桂东红色资源优异、地理区位优势、社会环境优良等独特优势，大力赓续红色基因，着力发展红色教育、红色旅游、红色经济。依托“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文化内涵，全力打响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纪律文化、革命文化、廉政文化品牌；精心打磨“第一军规”颁布地、红军长征首发地等精品景点景区，争取纳入大湘南、井冈山旅游板块精品线路；创新筹建纪律教育学院，抓好沙田红色教育基地建设，努力构建内外互联互通的交通网络，着力拓展红色旅游产业链，充分点燃践行“三高四新”战略、促进高质量发展的“红色引擎”。

注重绿色赋能，把生态优势转变为经济强势。秉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落实“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要求，紧扣“打造国家重要先进制造业高地、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科技创新高地”，结合郴州市建设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桂东县区），推动产业高端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做优精细农业，加速建设“优质农副产品供应基地”，大力实施农业产业“个十百千”工程，扎实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做强生态工业，积极引进生态绿色环保企业，着重创新发展中药制药、生物基因产业，以创新引领产业转型升级；做精全域旅游，坚持“全景桂东、全域旅游、全民幸福”理念，重点发展康养休闲、乡村旅游、精品民宿等旅游产业，持续唱

响“桂东山水爽天下”旅游品牌，着力打造旅游度假目的地、休闲康养首善地、宜居益寿优选地，为高质量发展注入“绿色动能”。

释放改革效应，把山区腹地转型为开放高地。桂东地处湘赣边界、罗霄山脉腹地，武深高速通车后，深度融入了长株潭、粤港澳三小时经济圈，发展区位优势明显改善。桂东将坚持创新引领开放崛起，紧扣“打造内陆地区改革开放的高地”，一手大力抓改革，扎实推进深化国资国企、投融资体制、要素市场化配置、“放管服”等“四大改革行动”，探索并践行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城乡建设规划、土地利用规划和生态环保规划“四规合一”，积极构建以“政治建设为核心”和“自治+德治+法治”三治融合的“一核三治”治理体系，以改革激活力提效能。一手竭力促开放，完善开放型经济体制机制，全面主动融入湘南湘西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和湖南自贸试验区郴州片区建设，积极对接粤港澳大湾区，立足现有产业链，找准强链、补链、延链等环节，推动优势产业“全产业链”集成、创新、升级，实现更深层次改革和更高水平开放。

坚持有机衔接，把脱贫成效转换为振兴实效。紧盯“三高四新”战略目标，深入推进全面脱贫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深度融合。强化扶心扶志，激活农民自我发展的内生动力，切实发挥农民在乡村振兴中的主体作用；抓实产业扶持，激励广大农户参与产业发展，以产业兴旺助推乡村振兴；提质公共服务，持续推进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全面完善村（社区）综合服务平台功能，大幅提质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筑牢乡村振兴基础；建好支撑平台，创新出台并落实《关于推进村集体经济组织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以村（社区）党组织领办合作社，充分发挥全县113个村（社区）集体经济组织发展服务公司的平台作用，扎实抓好土地流转、订单产销、劳务输出、民宿经济等，促进村集体经济发展和群众增收致富，为乡村振兴提供坚实支撑。

（作者系中共桂东县委书记）

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现实、历史和理论依据

毛俊响

2020年3月21日，习近平主席就法国发生新冠肺炎疫情向法国总统马克龙致慰问电时，首次提出“打造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此后，习近平总书记又分别在多种场合重申这一倡议。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是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大流行背景下提出的重大倡议，是站在人类发展的高度、面向人类未来提出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具有充分的现实、历史和理论依据。

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具有充分的现实依据。第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一战略判断。无论是从世界经济重心向太平洋转移的趋势来看，还是从世界格局向多极化方向发展的规律来看，中国都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要推动力量。适时提出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是中国坚持多边主义、承担更多国际责任的重要表现。第二，新冠肺炎疫情给人类公共卫生安全造成极其严重的现实威胁。此次疫情波及范围广、死亡率高、大部分国家的应对措施有效性低，对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造成了严重侵害。“坚决维护中国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也坚决维护世界各国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是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本质追求。第三，防控新冠肺炎疫情的合作因凸显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必要性。此次防控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行动已暴露出许多不足，充分证实了革新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体系的紧迫性。完善全球公共卫生治理，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是应对全球公共卫生危机的必由之路。

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具有坚实的历史依据。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是全球公共卫生治理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公共卫生的一国治理——公共卫生的区域治理——公共卫生的国际治理——公共卫生的全球治理”是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的演变趋势。这一趋势的核心特征便是国际合作，其未来方向便是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众所周知，全球化给全球公共卫生带来极大危害，直接导致了或者加重了跨境的卫生风险。在全球化的冲击下，公共健康问题由单纯的国内事件演变成成为全球公共卫生危机。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个别国家搞单边主义，将本国利益凌驾于其他国家和国际社会利益之上，严重阻碍了国际社会共同团结抗疫的进程，其教训不可谓不深刻。全球公共卫生危机呼唤全球公共卫生

治理。通过团结合作来促进全球健康的公平与正义，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是人类应对全球公共卫生危机过程中得出的历史教训。

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具有厚实的理论依据。第一，全球化与风险社会理论。全球化发展增加了风险的全域传播与潜在后果。从某种程度来讲，全球化下的国际社会也是一个全球风险社会。面对共同的全球风险，人类必须加强整体性共识和共同体意识。在全球卫生健康危机背景下，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体现了应对全球风险的现实紧迫性。第二，共同利益理论。人类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是国际公共卫生安全合作的共同利益，也是打造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动力和保障。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的态势愈发凸显了加强国际防疫合作维护共同利益的重要性，国际合作才是实现共同利益的共赢之举。第三，全球正义理论。全球正义理论认为，个人权利和社会福利、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代内和代际之间创设一种适当的平衡，乃是有关正义的主要考虑之一。中国倡导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寻求人类命运共同体面临的公共卫生发展赤字，正是全球正义的现实体现。第四，全球健康理论。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推动健康问题的综合化和健康危机的全球化。除了传统的卫生健康领域，全球化所导致的潜在的社会经济因素、人口环境变化因素等都都对公共卫生造成了极大的影响。全球健康关注全球范围健康的公平性和健康影响因素，而不仅仅是一个特定国家或地区人群的健康状况及其健康影响因素。因此，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核心应是采取全球共同行动应对跨越国界的健康问题及其决定因素。

当然，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并不是一个孤立的概念。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内容和实践延伸。扎实推进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建设，不仅有助于丰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外延，更有利于增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共识从而助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早日实现。

（作者系中南大学法学院党委书记、教授）

弘扬中医传统文化精华，建设“健康中国”

刘蔚

中医传统文化精华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蕴含的驱瘟断疫文化，更是数千年来护佑中华民族得以无数次摆脱各类瘟疫席卷的厄运而生生不息的最重要原因之一，也是中华传统医药文化最核心的内容之一。十九届五中全会要求“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并明确提出到2035年要建成“健康中国”的远景目标，这就意味着要进一步提升我国公共卫生治理能力。在新时代，对中医驱瘟断疫文化等传统文化精华进行创新性转化和创造性发展可为提升我国公共卫生治理能力作出更大的贡献。

重大瘟疫，虽然并非常常发生，但必会有时发生。这是中医驱瘟断疫文化在归纳瘟疫发生的客观规律之后产生的提醒与告诫：人们必须保持对重大瘟疫的警惕之心，万万不可因为一段时期没有重大瘟疫发生就放松警惕。唐代药王孙思邈在《千金方》中提出：“有天行瘟疫得者，即天地变化之一气也，斯盖造化必然之理，不得无之。”孙思邈将瘟疫发生的原因归结为自然之理，摒弃鬼神

之说：“原霍乱之为病也，皆因饮食，非关鬼神。”并视瘟疫发生为不可避免的事情。北齐杂家著作《刘子》中有：“寒暑不时则疾疫。”宋代养生专著《混俗颐生录》有言曰：“气候小差，人多疾疫。”可见孙思邈对瘟疫发生论的科学、客观分析，在中医驱瘟断疫文化中广为流传，影响深远。了解重大瘟疫必会有时发生的客观必然性，这就要求人们即使在一段时期并无重大瘟疫发生之时，也保持忧患意识、警惕意识，并时时刻刻、一如既往地重视传承弘扬传统医学中荟萃的对抗瘟疫的药方、思想等中医传统文化精华。

驱瘟断疫，是众多传统中医名著中共有的、最核心的内容之一。中国科学家屠呦呦在瑞典发表获得诺贝尔奖的演讲时，以《青蒿素的发现：传统中医献给世界的礼物》为题，盛赞中医名著《肘后备急方》等对世界医学发展的贡献。我国晋代医学家葛洪在《肘后备急方》中关于青蒿防治疟疾的记载，就属于医书中的驱瘟断疫内容。据《道藏》收录的《葛仙翁肘后备急方》权威版本，医书中“治卒霍乱诸急方第十二”“治伤寒时气瘟病方第十三”“治寒热诸疟方第十六”“治卒发黄疸诸黄病第三十一”等篇，共有防治霍乱、疟疾、黄疸

等驱瘟断疫的医方270余条，占比高达医书记载全部医方数目的21%，可见中华传统医药文化对于驱瘟断疫内容的珍视。

中华传统医学的养生学极其发达，这是中医学区别于其他民族医学的最重要特征之一，体现的是“防患于治”的特色智慧，这与中医驱瘟断疫文化密切相关。《黄帝内经素问遗篇》提出：“即正气存中而神守其本，即邪害正气不犯之。”以养生学提高免疫力，是日常对抗瘟疫来袭的重要方法。一些重大瘟疫突然发生之时，尤其是非典、新冠等人类未知病毒入侵的最初时刻，即使高水平医学家也措手不及，很难做到及时准确诊断、有效治疗。人们对未知瘟疫的逐渐认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这漫长的对未知瘟疫的认识过程中，以养生学来提高人体免疫力是“以不变应万变”的智慧之举。养生学的学科目标是，提高免疫力，减少人群中的亚健康比例。在现代医学视野中，亚健康人群，免疫力相对低下，在疫病面前即危险的易感人群。未知瘟疫一旦发生，迅速传播，夺命无数。在瘟疫尚未发生的平日，就大力提倡以养生学提高免疫力，日积月累减少人群中亚健康比例，对于驱瘟断疫，实在是未雨绸缪的良策之一。

“十四五”规划将“卫生健康体系更加完善”正式确定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之一。维护人民健康，建设健康中国，是实实在在为人民谋幸福的民生大事。传承弘扬中医驱瘟断疫文化、防治各类瘟疫，降低瘟疫危害，是新时代推进“健康中国”战略的应有之义。

（作者系湖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湖南中医药大学基地研究员，本文系省社科联课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在 关 联 研 究 》〔编号：XSP17BZZ097〕阶段性成果）

